

论《史记》中“荆轲刺秦”的文学书写

刘蓝蓝 韩红宇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 重庆 404100

摘要:《刺客列传》对刺客群体的书写超群绝伦,尤其是“荆轲刺秦”这一事件的突出展示,在史传的叙事传统上极尽文学文体之能事,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文学书写,其叙事周密、全知叙事视角和艺术手法的使用也使它在众多史传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独具民族特质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荆轲刺秦;结构;视角;想象;对比

引言

“荆轲刺秦”的故事在中国流传已久,《战国策》和《史记·刺客列传》对此有过相关记载,精彩程度为大众所称道,《刺客列传》取材于历史,演绎于文学,以五位刺客及其事件为主要描写对象,叙述带有明显的史传风格。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写代表了《刺客列传》在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上的极高成就。其中,《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一事继承《战国策》中的大量篇幅,可见其源出于史传文学的题材取向传统,“刺秦”这一过程的全面展示,因文学手法的运用显示出极高超的叙事艺术。

一、叙述故事结构连贯、有始有终

叙事和史传在文章中有着天然的联系,史传重在描写历史人物,传统上指史书中文学性强、刻画人物形象精彩的传记。《四库全书总目》对传记的定义是“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1]如果从历史角度分析,传记仅仅指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刺客列传》即属此类。

《刺客列传》作为专为刺客记录的历史,文中出现了五位刺客,分别是鲁人曹沫、吴人专诸、晋人豫让、轲国聂政和卫人荆轲,五位刺客有相对完整的活动经历。写“刺秦”一事时,司马迁在《战国策》的基础上增加了荆轲的个人介绍,与上文其他四位刺客的介绍流

程保持一致,完善了传主的个人信息,同时易于对比,更能衬托出《刺客列传》中荆轲故事的极强感染力,展现出史传作品的文学化书写倾向,也使故事有了极强的可读性。《刺客列传》全文六千余字,荆轲一人所占篇幅过半,可见在所写的诸位刺客中,荆轲是《刺客列传》的重点,也是核心。文中不仅介绍了荆轲的身份、籍贯,甚至对荆轲的个人兴趣爱好与交游进行了全面具体的描述。荆轲爱好读书击剑、游说卫元君、与盖聂论剑,与鲁句践接触等,因为喜好音乐,酒酣后在街市上配合高渐离击筑和歌,还经常与贤豪长者结交,也正是因为这样结识了田先生而有机会被引荐刺秦,这些叙述在《战国策》中未曾出现,可见是特意为了引出刺秦活动所做的铺垫。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却紧扣主题,显示出环环相扣的紧密逻辑。文中提到荆轲与盖聂论剑失败,盖聂评价荆轲为“不称者”,说明荆轲武艺有所欠缺,到后文刺秦失败,至此论剑时的“不称者”就成了伏笔,看似描写的是无关事件,实际上仍是为主题服务,结构连贯。

除此之外,“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句在史传叙事中前后亦有呼应。易水送别时,荆轲“往而不返”的选择和《易水歌》中的“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相互照应。文中相对照的地方还有篇幅一开始的荆轲高渐离和歌击筑,易水送别之时场景复现,再到最后荆轲失败高渐离击筑刺秦,情感基调也从欢快至悲凉再到悲壮,整个过程可以说用音乐为刺秦大业作伴奏。

虽然“荆轲刺秦”这一叙述取自《战国策》,但是却超越了《战国策》。在有始有终的人物结果展示上,《战国策》中以太子丹死、燕国被灭后高渐离接替荆轲刺杀秦王失败成为最终结局。但是《刺客列传》还补充了

作者简介:刘蓝蓝(1996-),女,汉族,籍贯:河南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荆轲之客”皆亡的结局，做到了有始有终，故事更加完整，并且还对结果进行复盘，鲁句践认为荆轲刺秦失败是因为其剑术不精，与一开始盖聂“不称者”的评价契合，保持了前后一致。

《刺客列传》作为类传，还描写了专诸、豫让、聂政和曹沫几位刺客的英勇事迹，在描写过程中，人物被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事件环环相扣，体现出历史化倾向的同时，凭借《史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对这些人物及其事件的广泛、恒久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历史性的基础上兼具文学性，史传文学由此开辟先河。

二、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方式

石昌渝先生认为史传孕育了小说文体并师从史传^[2]，从史传中汲取营养，小说类文体吸纳史传写作笔法成为文学作品的过程，可以看做史传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并指出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体在叙事上总体采用的是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3]

叙事视角是在表述事件过程中对故事主体进行表达的特定角度。不同于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全知叙述的视角没有特定的角色立场，却可以像上帝般俯瞰全局，任何角度、任何时空都可以接续前文，作为读者可看到在各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清晰明了的认识，人物心理也恰如其分。所以，如此广阔的自由叙事情境，表现诡谲变换的政治社会恰到好处，做到收放自如。历史为经，文学为纬，经纬交叉，在历史的坐标上加以想象，将历史真实和文学叙述结合为一体，为后世叙事文学的模范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作为后世刺客文学的重要源头，“荆轲刺秦”取材于史传，无疑这与史传作品极高的叙事艺术密不可分，“史传乃是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真正渊薮，中国古代的叙事艺术最集中地表现于古史之中”。^[4]在“荆轲刺秦”的书写中，题材的选择接力史传作品传统，叙事线索也严格按照时间发展，同时也忠实记录了历史事件的线性顺序。“荆轲刺秦”以卫人荆轲刺杀秦皇嬴政为主要目标，串联起一系列历史，在叙述中塑造了一大批丰满的人物形象，全知全能的叙事传统在叙述中不断扩大和深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观澜溯源，文学在历史中的渗透不容忽视。

作为历史资料，《史记》在文学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全知全能叙述视角的采用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专为刺客列出的合集，《刺客列传》详细完整地记述了足以影响政局的几位刺客的故事，从史家式的全知全

能叙述视角，巧妙链接历史事件，精心刻画历史人物，完美展现复杂的历史图景。尤其是《刺客列传》“刺秦”的部分与《战国策》所写几乎无异，篇幅之长，剧情之紧凑，尤其是“刺秦”到达高潮时场上众人的表现，让读者尽收眼底。文章从刺杀时荆轲左右手的配合到追逐时两人的走位再到秦王嬴政负剑拔出击中荆轲，其精彩程度远远超过传统史传作品，视角的转换有利于驾驭紧张刺激的场面，以其他人的表现展示出场上激烈的追逐时刻，仿佛在阅读中亲临现场，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给人极大震撼。结尾处对于高渐离刺秦全知视角般的叙述，从更名换装到瞞目击筑刺秦，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表现出游刃有余的叙述特色。

三、想象和对比的艺术手法

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反思意识，从记录历史事实到以人物为传，史传文学中对人的描写从司马迁开始有了文学的审美意味，以传人叙事为中心的史传文学倾向于选择人物性格中的一两个特征，有意忽略其他方面，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色。即“史传文学不仅具有历史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而且具有文学的艺术性和形象性”。^[5]史传遵循实录原则，即尊重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展示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史记》常见的人物刻画形式是：“司马迁从人物生平中选取一两个关键场景进行叙述，由此凸显历史人物性格中的某种显著特征。这是历史人物的半身肖像画，人物形象并不完整，但是人物本身的个性特征却有了生动形象的展示。”^[6]《战国策》在刻画人物时，运用了多种不同的写作手法，对比、动作形态以及细节等方面描写恰到好处，并善于在斗争和矛盾中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的塑造不再片面。司马迁在撰写《刺客列传》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但人物形象要比《战国策》中的更加丰满。《史记》之前，史传作品中的人物多是片面化的正义或邪恶，而司马迁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剖析人物事件更注重背后的成因，人物不再是只有善恶的区别，事件描述也更加全面。

在突出展示荆轲的认为形象上，首先是想象艺术手法的使用。“荆轲刺秦”虽借鉴《战国策》，但其中大量的对话描写来源于想象。高渐离“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的对话语句不可能是亲眼所见，即便是借鉴《战国策》，但每一句话语都亲历现场记录的可能性极低，尤其是荆轲独特的个性特征，无论是刺杀前因太子催促引发不满对太子的呵斥还是失败后

对嬴政的“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在显示荆轲鲜明的个性之外，还可见想象手法的使用。

其次便是对比。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分别对《左传》中的专诸，《战国策》中豫让、聂政和荆轲及《公羊传》中的曹沫五人的原有素材进行了加工与改写，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人生的经历、感悟与思想，将素材与个人的情感与经历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符合他人格理想的刺客形象，集中传达出司马迁对于“士为知己者死”这一理想人格的寄托。至于刺客形象的再创作问题，“作者对原有史料素材的加工和改写，就其性质来讲，实际分属两种不同的范畴：一类纯属历史编纂；一类同时还进行了文学再创作。”^[7]《刺客列传》在前代历史文献和传说的基础上，融合作者自身经历创作出来的作品，可以视为再创作。司马迁对刺客的再创作过程就是刺客的重塑过程，司马迁重塑刺客的过程中增加了刺客的背景介绍，对刺客所具有的性格，付诸的言行及展现的精神进行了全面的展现。按照现实情况，刺客的人物对话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但是文学的想象性弥补了这一短板，豫让的“士为知己者死”也成为整个《刺客列传》的核心理念。在塑造刺客的形象时，司马迁为了使所塑造的人物更为丰满，不仅着力对刺客在刺杀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性格进行刻画，还对刺客所表现出的思想进行展示，更为全面的展现刺客形象，五位刺客在同一篇章中出现，无形之中便有了对比，在“荆轲刺秦”一事上，高渐离的刺杀行为也可视为两人的对比，以此衬托刺秦的主角荆轲。整体上，他们都遵守司马迁以“义”为主的人格理念，在这些理念下的刺杀行为也有了更为合理的外衣，更符合司马迁想借此传达的理念。

然而，史传叙事传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皇权的专制政治文化。传统的入传人物其生活轨迹往往与政治紧密相关，作品在人物政治背景、政治生活的相关描述上浓墨重彩，而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则有较大空缺。《刺客列传》的记载范围相对以往史传作品有所改进，尤其

是在文学方面有了较大改善，作品的文学化倾向消解了部分历史的厚重感和政治的敏感性，推动了故事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在《刺客列传》结尾，司马迁认为五人无论事成与否，他们的志气和意志都可歌可颂，名流后世。联想司马迁个人经历，刺客为义赴死的信念和史官秉笔直书的修史信念在作品中完成了交融。

综上所述，对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化的改编，不仅使刺客形象深入人心，也让人更容易共情刺客身上所凝聚的人格思想，并通过刺客形象表现出司马迁所认同并赞赏的侠义精神。《刺客列传》以“荆轲刺秦”为代表，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特色和理想信念，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五人各具特色，他们所表现出的崇尚义、勇、信的精神内涵，重构了士大夫群体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在悲剧性形象方面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发现，在文学性的解读下，史传文学对于独具民族特质的传统文化的发掘阐释乃至对于文化的发展与建构都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清)永瑢,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 [3]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 [4] 董乃斌.论中国叙事文学的演变轨迹[J].文学遗产,1987.
- [5] 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
- [6] 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 [7]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五十年文萃 3[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